

马克思主义:“学党史、悟思想”研究专题

## 经典文本、历史反思和创新践行:把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辩证关系的三个基本维度

关 锋

**【摘 要】** 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的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探索两者辩证关系的标志性成就。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生产力的增长、提高有两种视角,一种是通过解除外在束缚、消除外在阻碍来促进,另一种是通过优化生产力内部要素如工具、技术及其组合来直接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探索创造性地将前者称为“解放生产力”,后者相应地称为“发展生产力”。但早期探索时也存在过于重视革命而忽视了改革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进而主张基本制度确立后,社会主义存在的只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两个讲全了”在具有鲜明的历史反思性和专门的具体针对性情况下提出。“两个讲全了”提出后,人们重视通过实践创新来实现两者的辩证关系,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表现尤为突出。是以,经典文本依据、具体历史反思和当下创新践行,构成把握两者辩证关系的三个基本维度。

**【关键词】** “两个讲全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辩证关系

邓小平著名的 1992 年系列南方谈话,第一次谈话就强调,社会主义要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既要注意通过改革解除各种外在束缚来解放生产力,亦要通过优化组合生产内部要素来发展生产力,要“两个讲全了”。改革开放前我国发展之所以出现挫折和失误,就是因为没有把两个讲全。稍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贯彻了“两个讲全了”思想。两者的并提并用,在很多官方重要文件、讲话中几近成为“标配”,因之受到国内理论界长期的重点关注。相较而言,以下三个基本问题关注得并不充分:第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说法,可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找到一定的依据?如果有,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成果的合法性就更为充足。第二,依据谈话原文可看出,“两个讲全了”既是在已有的认识基础上提出来的,又是针对原来没有讲全而言的,有明显的历史反思性、具体针对性。它到底具体针对了什么?第三,“两个讲全了”中蕴含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这是最核心的),在后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中,是如何被不断地深化认识和创新践行的?三者搞不清楚,就难以深刻解悟探索两者辩证关系的价值和意义。

关锋,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63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研究”(20&ZD002)的研究成果。

## 一、“两个讲全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辩证关系探索的标志性成就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和基础,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能取代之前的,是因为它更能适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sup>①</sup>,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生产力“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sup>②</sup>。

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当时处在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看到了落后国家独立解放、谋求发展的希望。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在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一方面强调了阶级斗争、革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抓住了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义。高度重视生产力,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基点和显著特征。在1937年《矛盾论》中,毛泽东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sup>③</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更快、更好地实现生产力大发展,成为全党的基本共识。社会主义中国70多年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求解生产力发展难题的历史。

其间,我们有过艰辛的探索,存在一定的失误,但也形成了卓越的创新贡献。后者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的“两个讲全了”。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在初步反思“文革”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优越性,最根本的就是能“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我们“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sup>④</sup>1984年,他在试图总结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上述讲话中的“发展生产力”是一般和广义上的,和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是等义的,即生产力的增长、提高、扩充。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经过改革开放的探索,我们对此有了清晰的认知。1992年南方谈话第一次谈话,就明确总结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诸如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sup>⑤</sup>稍后的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列作为两个重要内容。这就是著名的“两个讲全了”。

“两个讲全了”中的“发展生产力”是和“解放生产力”相对应、专门意义上的,而不再是一般和广义上的。所谓解放生产力,就是指通过革命、改革解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外在束缚、障碍、阻力以及一些破坏性因素,它着重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外在因素的革新来使生产力获得增长、提高、扩充;而发展生产力则重在强调生产过程内部要素,如劳动者素养、技术、机器设备、管理和组织,一方面是生产中的要素优化,另一方面是要素直接组合的优化。“两个讲全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了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两大基本理路,相对完整地呈现了现代社会谋取生产力发展的基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370页。

图景,可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在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具有内在关联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在社会主义阶段,解放生产力无疑具有基础性、前提性,只有通过改革不断解放生产力,才能更好地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多次强调“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还更为明确地说“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sup>①</sup>。其次,聚焦于生产力基本要素、生产过程内在要素的优化来不断发展生产力,则反过来推动改革不断深入,从而使解放生产力向更深处迈进。改革在此有两层指向,一是生产力内部要素组合方式的优化革新,改革生产主体(以企业为代表)内部的管理机制、生产流程、技术应用等,二是更宏观的、外在的,即对主要属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范畴的社会制度、体制的改革。第一层指向属于发展生产力,但当它逐渐深入时,必然触及和需要更深层次的、解放社会生产力意义上的改革,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会助推和倒逼解放生产力。所以邓小平上述讲话强调我们既要搞好“技术上的重大改革”,又要搞好“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sup>②</sup>。再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相对的划分,现实中彼此渗透,合理的思路就是想方设法通过改革,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南方谈话为此一方面强调“改革是全面的”<sup>③</sup>,涉及到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我们推出一系列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在改革中实现生产技术、管理现代化和劳动者现代化,“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强调改革科技体制以使现代科技更好地融入生产。核心指向就是通过改革实现两者良性互动、辩证合力。

一言蔽之,“两个讲全了”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辩证关系探索的标志性成就。

## 二、解除外在束缚与内在要素优化:经典文本中的两种视角

“两个讲全了”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说法,是否有相关的经典文本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一个经典表述,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sup>④</sup>。生产力在其发展中,会遇到外在的约束和阻力(特别是陈旧腐朽的生产关系)。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经常出现的观点,生产力“桎梏”的说法也多次出现。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指出:“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sup>⑤</sup>《资本论》说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因为“受它束缚的力量”即生产力“活动起来”<sup>⑥</sup>。

这一系列表述,引发一些著名的阐释和争议。典型的如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柯亨,20世纪70年代在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建构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提出“发展命题”,即人类因有理性,不断运用聪明才智改变物质匮乏状态,进而使生产力自发地不断增长;并因此逐渐受到旧有生产关系的约束和阻碍,当两者关系紧张到一定程度,革命爆发,催生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首要性命题)。其实质就是主张生产力有自我发展的内在趋势。柯亨还分析说,在马克思那里,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370、13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6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59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3页。

革命重心在于社会关系的变革,然而革命的发生却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革命将使它能够重新发展。革命的作用是“解放生产力”<sup>①</sup>。

柯亨提出的革命“解放生产力”之说,如前引文,马克思主义的确有很多显性经典文本支持,这是其很重要的维度。不过,这个维度不宜夸大和简单化理解。因为还有另一种维度,它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时表现较为明显。《共产党宣言》指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曾极大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大增长;但时至今日以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社会危机(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日趋严重为标志,对生产力的破坏和阻碍日益明显。但即使这样,因为追逐利润、市场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采用新技术,进而使管理更为科学、更有效率,既有代表技术创新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也有管理创新、劳动方式创新,进而形成了“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sup>②</sup>,生产力仍持续增长。马克思为此说:“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sup>③</sup>西方不少学者称此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资本主义悖论”。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资本主义在竞争和创新驱动方面表现更为明显,很快从“电力革命”走向“电子革命”,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更为突出,生产力仍处在发展状态。这种维度,可称之为“发展生产力”。

鉴于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表人物韦尔特意说:“对马克思思想进行解读。‘发展’和‘阻碍’这两个术语仍旧值得重视。”而“发展可采用很多方式。在研究资本主义时,马克思倾向于强调生产工具变革中的技术发展,……这种发展也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sup>④</sup>。他强调,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分析路径,一种是诸如革命等解放生产力造成的生产力质变,一种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诸如技术创新等直接驱动所造成的生产力量化发展。

概言之,解除外在束缚、桎梏的“解放生产力”与内在于生产要素优化直接驱动的“发展生产力”,确实构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分析生产力发展的两种视角。“两个讲全了”以及它所彰显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之间的辩证互动,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思想,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明确化、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了。这是把握两者辩证关系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探索和具体历史反思:“两个讲全”何以提出

前述双重分析视角,马克思、恩格斯更为看重通过革命实现解放生产力这个路径。正如韦尔分析的,通过技术革新实现的发展生产力,对他们来说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量的发展,但通过革命、建立新生产关系,将带来生产力质的变化;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但更高效,而且更符合人性(对劳动者来说,不再是异己的力量)、更具生态意蕴和效益(更少奢侈性浪费)。革命解放生产力,很快获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认可。

早在1937年《矛盾论》中,毛泽东代表中共一方面彰显了生产力决定论,另一方面也提出“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sup>⑤</sup>。而当时的中国,生产关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革命改变它。

①[英]G. A.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2、47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0页。

④[加]罗伯特·韦尔:《解放生产力》,李秀玲译,《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5-326页。

1944年,毛泽东提醒全党,“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題”,“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是为着解放生产力”<sup>①</sup>。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解放生产力这个维度比较早的明确提出和界定。1948年,毛泽东更明确地说:“生产力本身的要求,则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使全国一切积极的生产力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sup>②</sup>。通过革命破除旧生产关系,解除生产力的束缚,进而实现解放生产力,就成了中国共产党谋求生产力发展的主导理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在第一届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从各种束缚和限制中“解放我国的生产力”<sup>③</sup>。与此同时,我们对革命的认识有了深化,强调“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sup>④</sup>。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就是摧毁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1956年初,毛泽东总结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三大改造即使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也“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sup>⑤</sup> 解放生产力说法深入人心,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放生产力,就成为早期探索的主导理路。

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变,的确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恢复元气、得到有效发展,仅仅到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相较于1949年平均年增长20%、总增长达77.6%,同期国民收入增长69.8%。1953—1956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8.9%。更可贵的是,我们毕竟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很早就认识到列宁的提醒(没有发达的大工业,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前述第二种理路,即包括提高技术含量、改变劳动方式、提升生产者素质等优化生产力内在要素的方式来直接驱动的“发展生产力”,同样重要。所以,我们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强调“一化三改造”,工业化和所有制革命同时进行,工业化的核心是科技现代化。毛泽东在1955年特意点明我们除了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还“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sup>⑥</sup>。技术革命是一种特定的用法,既可能指一种重大的技术创新,也可能指它对劳动方式、生产力增长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不管哪一种都是和政治革命(推翻旧政权)、生产关系革命不是同一意义上的,其关键是通过重大技术创新、革新来直接发展生产力。

的确,1949—1956年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既是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结果,也是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变劳动方式“发展生产力”的结果。鉴于此,中共八大确立了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再认为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反革命的敌对力量已基本肃清,国家“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这段话非常重要,其中提到的“发展生产力”,显然主要是和“解放生产力”并列意义上的,即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生产现代化、科技化)来使生产力获得增长、提高。这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比较明确地把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同时彰显出来的表述,称得上是重要的创新。我们还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体上适应生产力发展,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sup>⑦</sup>。

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8—10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8、215页。

这些判断和认识都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这种矛盾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化解它?新生产关系确立后只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否存在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在同期和稍后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对这些重要问题并没有自觉、清晰的认识,造成了不少挫折。

1958年推行的人民公社化取代了原来的合作社运动,这一方面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另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由此强调,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sup>①</sup>。这就是说,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是因为生产关系不够完善、不够“社会主义化”“解放生产力”还不彻底;所谓“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聚焦于巩固、推动生产关系的“更公更纯”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就是努力方向。他在1959年更明确地说,“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要记住,“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sup>②</sup>

正如八大正确指出的,这种矛盾实质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破”到“立”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先进的生产关系确实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但确立以后,如果不缓解、弥合它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反差,它就会成为新的束缚、障碍。换言之,当时合理的做法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上进行不断调整、变革,来适应落后的生产力,并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这应是当时非常必需的另一种形式的“解放生产力”,它也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

可惜这一点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过于看重“三大改造”取得的成就和人民公社化暂时的成果,选择了使生产关系更为先进的思路。生产关系越公越纯,就越不适应落后的生产力,以“一大二公”为目标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浮夸风”一起给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再加上一是当时国际共运出现了很多变数(如波匈事件),呈现出复杂的形势,二是包括党内高层在内对人民公社反思、批评日渐增多,毛泽东认为国内形成一批“走资派”,“右派”在得势,他们妄图通过否定人民公社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反而强化了他1957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一个思想即“坚持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sup>③</sup>。尽管他有时也知道有必要区分不同性质的革命,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传统革命的形式来巩固人民公社、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而促进生产力,成了他的主导理路,并不断付诸实践。以至后来爆发“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在现实中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

诸如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具体实践中,注意到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反差,对“大跃进”“共产风”“穷过渡”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如强调公有化不宜绝对,其范围和程度应有所限制,公有制实现形式可灵活一些,允许包工包产到户、私有经济一定范围内存在;允许商品经济存在、企业保留一定自主权;等等。这些调整确实不同于以阶级斗争为代表的“革命”,可惜的是,这些类似于后来改革的“解放生产力”的可贵探索,并没有成为主导力量。

“文革”结束后,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再次确认:“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sup>④</sup>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sup>⑤</sup>。当然,这里讲的“发展生产力”,是一般和广义上的。那么如何来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呢?改革很快给出了答案。我们知道,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0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1-13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4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

改革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过程中,大大激活了农村市场,出现了较有活力的个体经济、乡镇企业;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随着开放的扩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资经济。它们都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整个社会活力都被释放出来。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前那种“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恰恰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基本制度确立后仍存在外在于生产力的束缚、阻碍和桎梏。

随着改革深入,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诸如公有制等基本制度是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来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的,体制、机制具有相对独立性,如果不合理,脱离了实际,同样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外在束缚、桎梏。它们就是改革的重点,改革对社会活力的释放、对生产力的解放,聚焦于此。邓小平1985年3月明确说,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sup>①</sup>。后来他还总结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sup>②</sup>,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解放生产力不应只局限于革命这种形式;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任务,特别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任务尤为紧要,改革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解放生产力的主要途径和形式。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认识创新。

改革实践证明,三大改造后毛泽东只承认发展生产力不承认解放生产力,讲得不全,认识不对。针对该认识,越来越有必要明确反驳。1992年第一次南方谈话,邓小平专门详细解释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要通过社会主义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必须既讲发展生产力,又讲解放生产力。

显然,“两个讲全了”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说法,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早期的探索中就已提出,在此意义上,它总结和汲取了早期实践探索的合理成果。更重要的是,“两个讲全了”直接针对的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只存在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论断,而背后更深层次的则是针对早期探索的双重失误:看不到公有制确立后仍然存在着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任务;看不到只有通过改革来不断解放生产力,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两者不可分割。我们对两者辩证关系的把握,离不开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借鉴和反思。

#### 四、“两个讲全了”提出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辩证关系的创新实践

如前述,在“两个讲全了”提出的过程中,我们已认识到改革既有可能是针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大的体制、机制层面的,这一般属于解放生产力,也有可能是针对具体生产过程中技术、人员及其管理、经营方法等,这一般属于发展生产力,两种改革很难截然分开,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限于特定的历史针对性和为了凸显改革的重要性,1992年南方谈话重点强调改革和革命一样是解放生产力。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实践中越来越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广义“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内容;同时改革开放成效显著,不再需要从解放生产力的高度为其“正名”,所以,领导人正式讲话和官方重要文件,经常把两者合并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很少再像“两个讲全了”那样把两者明确进行界分。我们一方面反复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如十五大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列为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主要内容之一,十六大把“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执政兴国”的要义,十八大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夺取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不断推出改革举措和新发展理念,促进两

---

<sup>①</sup>《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8页。

<sup>②</sup>《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

者同向前进。如提出“先进生产力”理念,认识到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加快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在技术发展跨越的基础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跨越”<sup>①</sup>,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加快实施人才战略、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很好地整合起来,形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合力;提出“科学发展观”理念,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统筹推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诸如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所有生产要素的活力都迸发出来,既解放生产力,又发展生产力。2011年底我国 GDP 总量升为世界第二,这是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大发展的明显标志。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发展虽然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还很突出,但依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关键期,经济发展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进入新常态。在此背景下,我们提出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辩证统一起来,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整体跃升”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新时代更为重视推出实践规划、实践战略,在创新实践中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统一、有效整合,优化两者的辩证关系。其中较为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

其一,全面深化改革。经过多年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是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深入人心;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改革不仅仅是解放生产力,同时是发展生产力,比如国资国企改革,它既是理顺机制,同时也是优化管理、优化生产要素的直接组配,提高生产效率。无论是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改革都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所以,十八大一结束,习近平代表党和国家宣告“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新时代的历史责任。并且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不停顿、不止步。不过,在新时代,改革日益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改革内在的关联性、互动性日益明显。所以,一定要更为自觉地发挥生产关系多方面的反作用,勇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路径。

为此我们特别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sup>②</sup>围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and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先后推出 1600 多项改革方案,包括国资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司法体制、文化教育卫生管理体制,等等。中国 GDP 不但稳居世界第二,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社会生产力和激发社会活力很好地结合起来,获得了快速高质发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种维度被很好整合起来,相互支撑、良性互动。

其二,创新驱动战略。人类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为此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推动工程科技创新,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sup>③</sup>要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大力搞科技创新,驱使、推动产业、企业、产品、管理、市场、业态等多方面的创新,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和引领的经济发展模式。

而以科技创新为关键的创新驱动战略,围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个根本,迫切需要破除重要体制机制障碍。为此要“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

<sup>①</sup>《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

<sup>②</sup>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68、88页。

<sup>③</sup>习近平:《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人民日报》2014年6月4日。



关体制深刻变革”<sup>①</sup>,如加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科技决策机制,完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等。创新驱动就是创造条件、营造氛围,调动各方面创新积极性,让每一份创新活力都充分迸发,大力解放生产力。但它同时包含诸如新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管理方式的发明、创造,以及新的产品形式、产业形式(劳动方式),新的生产人才及其培养、管理机制的形成等等,这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为此指出,历史经验表明,“体制机制变革释放出的活力和创造力,科技进步造就的新产业和新产品,是历次重大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复苏的根本。”<sup>②</sup>创新驱动既是通过体制机制革新解放生产力,也是优化生产要素发展生产力,是两者的有机统一。

其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追求高质量发展。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国正处于转换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关期,原有高速增长阶段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无疑是战略目标和迫切要求。主要包括: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sup>③</sup>。建设融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为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先进制造业,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作用实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以及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互动,推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融合,通过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完善产业链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无疑都是重要途径。以谋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我们还大力宣扬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既涉及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改革,如创新驱动和创新型国家、分配体系改革、城乡区域关系平衡、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以解放生产力;也涉及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形态,涉及劳动力、技术、资本、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重组,涉及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等全要素生产率,直接关系“发展生产力”,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很好地统一起来,在实践中实现两者良性互动,形成发展合力。

## 五、余论

以上经典文本依据、具体历史反思和当下创新践行三个问题不但各自很重要,合起来更有重要意义,大体上可以组成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当下的完整历史脉络和逻辑链条,再鉴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重要性,把它们整合起来研究,无疑是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可或缺的理论进路。

立足于“两个讲全了”提出的前因后果,从文本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以来求解生产力发展难题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和内质,有助于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即归根结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到解放、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在探索中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两种维度在理论上明确彰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贡献。更重要的是,随着认识的深化,我们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实现两者良性互动、辩证整合的路径

<sup>①</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36-337页。

<sup>②</sup>习近平:《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6日。

<sup>③</sup>《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年2月1日。

和策略,推出一批新发展理念、战略、举措。也正是这些认识和实践的深化,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不断健康发展。新时代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这也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基本依循和努力方向。

(责任编辑:蒋永华)

## **Classical Texts,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Three Dimensions in Grasp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ancip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GUAN Feng

**Abstract:** “Full coverage of both the emancip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was proposed by Deng Xiaoping in the talks he gave in his 1992 inspection tour in south China. This was a landmark achie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explor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ancip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classical texts of Marxism, there are two perspectives for the growth and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ity. One is to promote productivity by lifting external constraints and eliminating external obstacles, and the other is to optimize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productivity such as tools, technologie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to directly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In China’s early socialist explorations, the former was creatively referred to as “emancip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latter as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correspondingly. However, in the early exploration, there was also too much emphasis on revolution, and the liberation effect of reform on the productive forces was ignored to some extent. Later, it was proposed tha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ic system, socialism only had the problem of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Deng Xiaoping’s proposal for the full coverage of the two aspects of emancip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was due to his distinctive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pertinent to the urgent issues China was then facing. Since then, Chinese people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realiz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ancip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innovative practice, which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classical texts, specific historical reflections and current innovation practices constitute the three basic dimensions to grasp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ancip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full coverage of the two aspects; emancipating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bout the author:** GUAN Feng, PhD in Law, is Professor, Vice Dean, and PhD Supervisor of School of Maxi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